airiti

政大史粹第22期
2012年6月，頁81-118

研究討論

比較內藤湖南、宮崎市定與郝若貝的「唐宋時代觀」*

姚政志**

帶領中國古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最重要的人物，非內藤湖南莫屬。1909年，內藤湖南升任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講授「支那近世史」，著名的「唐宋時代觀」，又或「中國近世」說雛形初現。1914年，其關心辛亥革命後中國局勢發展的《支那論》出版，更完整的「唐宋時代觀」於焉誕生。二戰結束後，日本史學界檢討戰前的皇國史觀，內藤湖南的學說開始受到重視，圍繞其時代區分論的論爭應運而生。其中，支持內藤湖南「唐宋時代觀」最力的學者，是同京都大學出身的宮崎市定。宮崎市定雖然支持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但受到桑原騭藏影響，他採用西亞、中國、歐洲文明先後發達、互相影響的基調討論中國的近世特質，加強內藤湖南鮮少觸及的社會與經濟部門，對內藤湖南的平民地位提升論點有所修正。內藤湖南的學說在美國學界也引起廣大的回響。

* 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悉心指教。「中國」之概念廣博，非一文數字得以概括。本文仍未盡完善，期待日後再做深入的討論。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聯絡地址：臺北市11605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 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airiti

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從區域開發與人口密度變化帶來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情形著手論述，從地方史的角度挑戰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專制論。

然而，這些嘗試探討中國近世之「現代性」的論文，在不同的時代環境和學術氛圍下，結論也各不相同。筆者對三者均有談到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進行比較，認為可以歸納出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內在先進性」和郝若貝的「發展後停滯性」二種中國近世的歷史發展類型。不管是那種類型，中國宋代以後的歷史發展，都走向與歐洲的「現代性」不同的發展方向。

受到這些學說影響，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中國之現代性的論文紛紛出現。近來甚至有把宋元明三個時代當作一個轉折期的「宋-元-明變遷」論出現。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自有其發展之內在動力」是近來這些親論述的思考傾向，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特性，而非單一的比較性思考，不論是朝代之間的比較，又或中國與歐洲的比較。

關鍵詞：內藤湖南、宮崎市定、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唐宋時代觀、近世、現代性

airiti

一、前言

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曾說科學活動中有成爲「典範」(paradigms)者，可吸引研究者繼續來從事和典範相關的研究，[1]歷史研究中，最可堪稱「典範」者，非內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唐宋時代觀」不可。

「唐宋時代觀」是 1922 年，內藤湖南在《歷史と地理》上發表的短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次使用的字眼。此文章日後轉譯成中文，收在劉俊文主持、編輯下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一書中，成爲臺灣學生了解內藤湖南的理論非得閱讀不可的入門文章。

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如眾所周知，即內藤湖南說了這樣一句話：「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是近世的開端，其間包含了唐末到五代的過渡期，而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明顯地差異。」[2]像這樣利用西洋史的時代區分法代替中國史歷來以朝代興替爲時代區分的斷代方式，在同時代的日本，甚至中國來說，並非唯一的例子。但內藤湖南的特出之處在於他簡明地從「文化」的轉變來說明宋代的中國歷史之所以能畫歸爲「近世」的理由，截至今日仍無人能輕易撼動。

當我們在爲內藤湖南的洞見深表贊嘆之時，應該先知道，他的成就並非偶然，而是揉合了深厚的漢學素養、擔任記者工作時培養出來對時勢變化的敏銳洞察力，以及吸取日本、西洋和中國的優秀學問而成。因此，他對中國史的了解是全面性的，並對中國史的時代區分架構表達自己的看法：

>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洋史，經過相當長久的年代。從中國人的一般說法來看，近來甚至有人以黃帝以來四千幾百年為紀年者。而中國經常發生革命，各朝代之間又有連續，以之區別時代，咸被認為最便利。近來又有模倣西洋，區分成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者，一般以上古從開天闢地到三代，中世是兩漢、六朝，唐、宋是下個

---

[1] 孔恩(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 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53-54。

[2]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內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111。

airiti

> 階段，元、明、清又是一個階段。然而，從東洋整體的中國文化發展來說，毫無意義。真要有意義地畫分時代的話，就得要觀察因中國文化發展的波動而起的大勢變化，從內外兩方面來加以考慮。[3]

把中國史的發展放在東洋史的架構中來思考，探討中國文化與週邊民族文化的互動，便形成了四個階段，兩個過渡期的時代區分架構：一、從開天闢地到東漢中期的「上古時代」，分成中國文化形成的前期和中國文化向外發展的後期，更精確地說是中國文化從某個地方逐漸向其他地方擴展的時代。二、東漢後半葉到西晉爲「第一過渡期」，是中國文化暫時停止向外擴張的時代。三、五胡十六國到唐中葉屬於「中世時期」，是中國周邊民族因民族意識形成之故，其勢力反饋到中國內部的時代。四、從唐末到五代期間，屬於「第二過渡期」，是外來勢力在中國內部發展到頂點的時代。五、宋元時代的「近世前期」和明清時代的「近世後期」。[4]

所謂「近世」，即意味著自身所處的時代是「現代」，「現代」之前的時代即是「近世」。中國的宋元時代究竟是否合於「近世」的特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學界引起相當大的論爭。論爭最激烈的一把火，是由東京大學出身的前田直典(1915-1949)所點燃。他在一篇名爲〈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的文章中大力批判宇都宮清吉(1905-1998)、宮崎市定(1901-1995)等京都學派人等論述的上古與中世的差異性，認爲他們無法清楚地區分出上古與中世在社會文化的發展上究竟有何明顯差異，進而擔憂內藤湖南優秀的時代史觀是否因此而變得曖昧不明。實際上，他的論述已經間接地批評了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理論，主張唐代才是中國上古時代的終點，而宋代則是中世時代的起點。[5]以旁觀者的眼光來看，前田直典的時代立論根據與內藤湖南有明顯的差異。前田直典所謂的「中世」是西洋史上

---

[3]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10-11。

[4]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11-12。

[5] 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古代の終末〉，收入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205-222。(中譯本：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收入劉俊文 主編，黃約瑟 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135-152。)

airiti

的「中世」，並嘗試在西洋史框架的「中世」內理解中國上古與中世的斷代問題。內藤湖南則不然。他以為中國自古以來，文化即自成一格，即使有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的事實，也不足以撼動中國文化的既成格局。又中國文化不只在中國，不同種族、不同語言的國家也都沐浴其中，故而形成一個有系統性歷史。因此，以日本或歐洲的歷史發展過程為標準，認為中國的是變異，反而是誤解。中國文化是本身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來，與其他受到外來文化刺激而發展起來的文化並不相同。[6]故若說內藤湖南是在東洋史的框架中看中國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也無不可。在這一點上，前田直典也懷疑中國與週邊民族或國家是否真有那麼強烈的關連性或影響力，挑戰「中國」是否能成為東洋史發展之共主的可能。[7]

接前田直典之踵而來的「歷研派」在 194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間，興起了一場對於中國史的時代階段該如何畫分，其時代性質又是如何的大論戰。[8]與此同時，內藤湖南的學說也被帶往美國，受到美國宋史學者的注意。[9]

---

6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10、12。

7 前田直典認為：「在近代之前，世界各地的歷史尚未有共同性時，中國是一個世界，印度又是一個世界。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世界可以視為一個包括滿洲、朝鮮、安南等在內的東亞世界，這也是過去大家的看法。把日本放進這個世界中雖然多少有些猶疑，但我們亦曾考慮過這個可能性。不過，這只是文化史上的問題。究竟朝鮮、滿洲等社會的內部發展和中國有沒有關連性抑或平行性，我們近乎一無所知，日本更不必說。在歐洲的世界中，例如我們知道英國社會的發達與歐洲大陸有平行性，彼此相關。但在東亞方面，特別在日本和中國之間，是否有類似的情況，除近代史的領域外，至今不僅仍未解釋清楚，甚至可以說近乎未成為問題。一向的想法是，日本從古代至中世、近世的發展，在社會基礎構造上與大陸全然割離。對此，我們實有試作反思的必要。」見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古代の終末〉，205。(中譯本：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135。)

8 「歷史學研究會」：1932年，主要由一群住在東京的年輕歷史學研究者組成。他們的特徵是超越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分野，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觀察歷史現象，又對社會經濟史和民眾史特別關心。他們受到1930年前後馬克思主義普及的影響，也強烈地批判當時越來越強烈的軍國主義潮流。後來，因無法抵抗軍國主義的壓力，1944年時終於被迫全面地停止活動。戰後不久，該會重新開始活動，最初研究的主題是從歷史學上如何看待將軍國主義正當化的天皇制度。但是數年之後，世界陷入冷戰狀態，把日本也捲入其中，日本在占領下成了西方世界的一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世界戰略，也激化了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故歷史學在改造本身的舊體時，也得思考如何應付戰後新的現實問題。故歷史學研究會不只批判軍國主義，更嘗試全面地創建自己本身新的學說體系。而戰後的歷史學研究特徵主要有兩點：第一點：從世界史的立場來理解日本史、中國史、歐洲史等不同地域的歷史，反省日

airiti

本文擬就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論與兩篇受其影響、對中國宋代史研究非常具有啓發性的文章：宮崎市定之《東洋的近世》與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之“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提出討論。

本優越歷史觀，打破中國「停滯論」的歷史見解；第二點：「近代化」問題是共通的課題。見谷川道雄 編，《戰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10-13。

9 1969年，美國宋史學界的學者劉子健(1919-1993)和Peter J. Golas合編了*Change in Sung China: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 ?*一書。該書的導論略論了當時美國在中國史方面研究的概況。簡單來說，宋代因在政治、軍事或外交方面，比起漢、唐、清等規模大且穩定的王朝顯得沒有活力，最後甚至為蒙古攻滅，故不為研究者注意。多數學者提到宋代，只能強調其在文學和哲學方面的成就。直到最近(1969年當時)，由於日本漢學家的學說之故，研究者才體會到政治和軍事的成就不是中國王朝的歷史裡唯一可以誇躍之處。宋代是一個影響力重大的朝代，其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成就塑造了以後的中國。 該文集收入了兩篇談論唐宋之間變化的論文節本，一是1955年柯睿格(E. A. Kracke, Jr., 1908-1976)發表在*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的“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一是同年日本學者宮川尚志發表在同刊物上的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柯睿格指出，中國十到十三世紀的社會在傳統中變化，而經濟重心從北方向江南地方的移動是促成變化的主因。他說：「在十三世紀，中國的資產階級以他們的意志和智慧展示，在有利的條件下，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可以經由內部力量的運作而得到重要的改變。」底線部分的文字讀起來頗有內藤湖南的味道，因為他也強調中國在自己的歷史脈絡裡從中世走向近世。但翻查柯氏文章全文和註腳，並沒有一處提到內藤湖南。他是否多少熟悉內藤湖南的學說，礙於篇幅，筆者在此無法追究，但他應該知道同刊刊登的宮川尚志的文章。1969年，劉子健所指來自日本漢學家的影響者，宮川氏之文應當功不可沒。見James T. C. Liu and Peter J. 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 (Lexington: D.C. Heath & Co, 1969), vii;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收入張廣達，《史學 史家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107-108；E. A. Kracke, Jr.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 (Aug., 1955): 479-488; Hisayuki Miyakawa,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 (Aug., 1955): 533-552. 柯睿格的文章有中譯本，見柯睿格 著，陶晉生 譯，〈宋代社會：在傳統之內的變遷〉，收入陶晉生 等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1-12。

airiti

二、文本

(一)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對中國近世特徵之闡述，可見於三個版本。第一個是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卷後記中，1909 年初次在京都帝國大學開課時，學生記錄下來的版本。他在這個版本中還沒有明白指出「過渡期」的存在。第二個版本是 1914 年發表的《支那論》一書；1947 年出版的《支那近世史》是第三個版本。1922 年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可以視爲是以上諸版本的精節本。後述的兩個版本，均已經提出「過渡期」的概念，可見內藤湖南的中國史時代區分觀念乃是在京都帝大的學術生活中日趨成熟。中國近世的特徵究竟和前面的時代有何不同？他提出八點變化：(一)貴族政治衰頹與君主獨裁政治興起；(二)君主相對位置之變化；(三)君主權力之確立；(四)人民相對位置的變化；(五)官吏任用方法之變化；(六)朋黨性質的變化；(七)經濟方面的變化；(八)文化性質上的變化。[10]細觀諸點的敘述可以感覺到，他在政治文化變遷的論述比起經濟或學術思想活動方面的論述詳細很多，而他對第二個過渡期以來的討論，也比之前的時代階段詳盡。若搭配《支那論》來看，讀者就可以了解內藤湖南爲什麼要這樣討論中國的近世，因爲其中蘊含清朝衰亡、民初的混亂，以及中國必定走向共和主義的答案。

在以政治文化的變遷爲基礎的論述上，內藤湖南認爲主要的主要的表現有二，一是君主的相對地位與獨裁權力之確立，一是人民力量之受到承認。兩者都是在唐朝中期以後逐漸明顯化、相輔相成的現象。關於前者，自從貴族勢力瓦解之後，君主的地位便變得超然且絕對化。古來威脅帝位的因素一概消除，皇權不只能直接干預政事，也直接控制官員的任命大權。於是，皇帝大權在握，對官員無法完全授權的結果，官員變得「無責任」化。若在承平之時，這是一個對君權而言，極理想且安全的制度設計；若

[10] 內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 近世史の意義〉，《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347-359。

airiti

遇到內亂外患，沒有可以全權作主的封疆大吏，君權便變得岌岌可危。湖南視爲是清朝衰敗之始的嘉慶年間發生於橫跨陝西、湖北、四川三省的白蓮教之亂，就是最好的例子。亂事發生之後，地方人民無法依賴官兵，只好組成鄉勇團體來防禦，朝廷亦順其發展，承認這些地方團體的行爲。日後的太平天國之亂亦循地方士紳組團平亂的方式解決。[11]其他清廷與外國的交涉，亦由那些無實權的地方大臣負責，其結果越顯國力衰弱，直到清朝滅亡。[12]

後者所說的情況，其實是伴隨前者而來。因爲唐中葉以後，貴族政治逐漸瓦解，原由君主與貴族直接支配的、不被承認有私有權的人民，漸漸獲得解放。其反映出來的事實有：一、人民能夠通過科舉，實質地參與政治；二、私有財產權由於王安石實行變法的緣故而多少獲得承認。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和人民最接近的地方政治勢力——胥吏，掌握了地方行政體系的實權。因爲從隋唐時代開始實施「本籍迴避」制度，所有在地方上當官的人都是外來者，而其下直接處理民政的胥吏因爲長期熟悉當地業務之故，官員不得不倚賴他們辦事。又科舉出身的官僚，對實際政務的施作缺乏研究，也不得不依賴這些胥吏。久而久之，實際掌握地方政治實權的人，反而是那些沒有品官資格的胥吏，官員反倒成了附和胥吏的橡皮圖章。此風起於唐代，元朝時有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清代，甚至演變成官員不視事，政務全委之胥吏，以致胥吏危害鄉里、弊端叢生的狀況。不過，內藤湖南對此並不悲觀。他認爲，既然近世以來，胥吏實際掌握地方的政治，與人民最爲接近，若能將之排除，則人民就能更直接地參與政治，成爲政治上的要角。[13]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朋黨性質的變化」。近世中國政治文化上的新氣象，就是朝廷的黨爭由貴族時代的權力之爭，轉成帶有「政治理想」的理念之爭。儘管新型態的黨爭，如熙寧黨人與元祐黨人之爭，或明朝的東

---

[11] 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23；J. A. フォーゲル 著，井上裕正 訳，《內藤湖南：ポリディックスとシノロジー》(東京：平凡社，1989)，143。

[12] 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09-324。

[13] 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24-327。

airiti

林黨爭，莫不混雜了私人感情與道德指責，到了清代甚至由於皇帝嫌惡臣下結黨而加劇皇帝獨裁的傾向，但朋黨性質之變化中最重要的意義，莫過於「包含庶民的政治階級的意志之表現」。[14]這也是平民的地位提升，進而能夠參與政治中樞才可能產生的現象。

內藤湖南認爲，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治發展到清代，顯然已經達到極限；皇帝專制獨裁而導致的種種弊病，使得帝制的中國不得不走向衰敗、滅亡。當皇帝專制的弊端發生，正式官員對國家無法扶傾濟弱的時候，塡補這個功能缺口的，正好是「平民」。[15]此舉無疑是肯定了地方社會在中國走向共和政治過程中的地位。

經由以上簡要地分析，內藤湖南提出「唐宋時代觀」或「中國近世」的論述，到底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大致上已經了解。他嘗試進行的，不是爲中國的歷史定下近世的開端，而是按照「切實的意義」，尋找在「自己的現代之前的近世」究竟從何時開始。於是，他從清末看到的獨裁政治的弊端與地方社會的活絡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現象著手，尋找這些現象形成的起點，最後知道這些現象始於唐代中期，經過五代，到北宋以後終於固著下來。[16]諸現象的形成，是以平民地位之提升爲中心；以平民爲主的近世特徵在君主獨裁的弊害解除之後，會再繼續進行下去。故面對辛亥革命以來，又是二次革命，又是袁世凱帝制復辟等一系列反共和政治的亂象，他認爲，考量唐代以來的變遷，人民的自由或權力從完全不受承認的時代轉向獲得承認的時代這一點，人民終將成爲政治上的要角。審度歷史的潮流，加上當時與外國的交涉、留學生的見聞等，都不會再讓君主專制的局面恢復過來。若把共和政治之確立的希望寄託在地方社會的自治團體上，

---

14 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20-321；內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 近世史の意義〉，355。

15 湖南認為，當時中國的一般平民，尚無處理政治的思想，若胥吏一級的障礙除去，人民直接面對政治的話，還是得委由地方士紳來處理參政事務。見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27。

16 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08-309；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支那論』をめぐる問題——〉，收入內藤湖南研究会 編，《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166-174；J. A. フォーゲル 著，井上裕正 訳，《內藤湖南》，217。

airiti

讓人民擔任政治的主角，則中國必將走向理想的共和政治。[17]

(二)宮崎市定與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

以下將以較爲精要的方式介紹宮崎市定和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的論點。

一般的人咸認爲宮崎市定繼承了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論。事實上，他的中國近世論以及時代區分方法是既有接受，也有創新。[18]他的中國近世論

[17] 內藤湖南，《支那論》，〈一 君主制か共和制か〉，327-329。

[18] 宮崎市定(1901-1995)，1922年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就讀。專攻東洋史的他，曾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東洋史學的教授，與研究中國文學的狩野直喜學習。一般人都以為宮崎市定是內藤湖南的重要弟子，祖述其說，為之袒護。事實上並非如此。他自己曾說：「世上一般人似乎都把我當作內藤史學的後繼者，我自己卻不這麼認為。內藤湖南博士既是我的恩師，也是難以企及的權威，自然尊敬他。但我的研究是歷史學本身，而非其他。所以，有好的見解就採用，有不足的就加以補充，無法接受的就改正之。在主要是期待盡可能客觀地觀察事物，徹底地閱讀史料這一點上，我的治學方法毋寧是較接近桑原博士的吧！」他在確認自己的東史洋研究方向無誤而自信滿滿時說的這段話，一方面在端正視聽，確認自己的學術系譜，一方面也在說明自己的治學、學說與內藤湖南略有差異。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的治學方法或是見解的承受上，均受內藤湖南與桑原隲藏的影響。不過，宮崎市定並非從入京都大學開始，就接受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架構。1926年，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的宮崎市定進入日本岡山縣的第六高等學校任教，教授「東洋史概說」。那時候，他的見解與「唯物史觀」的中國史解釋類似，把唐代當作可和羅馬帝國相比較的古代，宋代以後才進入新的時代。但也由於任教之後數十年間，年年都得講授「東洋史概說」，故而不得不重新思考時代區分的問題。1935年到1937年間，宮崎市定奉文部省之命到法國留學，期間曾遊覽德國、義大利，又經由巴爾幹半島進入西亞，見識伊斯蘭世界，增廣見聞。這一番遊歷讓他感受到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在若干程度上，與宋代以後的中國沒有什麼不同，伊斯蘭世界令人驚訝的進步及後來的停滯性，也讓人印象深刻。經此一遊，他開始在世界史的架構內建立自己的史觀，發表〈条支と大秦と西海〉、〈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等文，並開始採用「到漢代為止是古代，三國到唐代是中世，宋代以後是近世，而鴉片戰爭以後是最近世」的時代區分方法。若是考慮中國與西亞或歐洲歷史過程的連結性，宮崎市定無疑是受到桑原隲藏的影響；若是時代區分法方面，他對內藤湖南的見解，有接受，也有修正，不盡全然相同。最足以證明者，就呈現在《東洋的近世》中。見宮崎市定，〈『アジア研究』第一 はじかき〉，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東京：岩波書店，1994)，489。或見宮崎市定，《アジア研究》，第1(京都：同朋舍，1957)，〈はじかき〉，4；宮崎市定，〈『アジア研究』第三 はじかき〉，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504-505；礪波 護、間野英二，〈宮崎市定〉，收入礪波 護、藤井讓治 編，《京

airiti

有以下四點特色，與內藤湖南的論說不同。第一：強調東洋、西亞與歐洲彼此文化間交通的重要性，以及西亞文化對中國近世文化的啓發作用；先進的西亞文化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活動，使宋代的社會被一種資本主義的傾向所支配。[19]

第二，重視內藤湖南著墨較少的「社會經濟」部門。宋代社會的資本主義傾向，表現在貨幣、勞動力人身之解放、城市坊市制度的崩潰和產品生產的商業化和分工化諸方面。然而，經濟、文化的發達並沒有帶來平等的社會。庶民階級再度分裂成上層與下層。宋代社會，在法治上，應是四民平等的狀態。實際上，由於經濟實力有差，社會間的貧富差距大，有一如貴族般富裕的地主階級，也有貧無立錐之地、倚賴地主階級生活的佃戶。地主世襲財富，壟斷科舉的權力，獨占朝廷官位，形成新貴族，或說是士大夫階級。依賴他們生存的佃戶，在現實的法律地位上受到差別對待，生存受到地主的束縛，儼然形成另一種社會階級，就連士大夫的輿論也間接承認這種不公現象的存在。這是士大夫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爲自身的地主階級辯護而形成的言論，頗合社會的實際現象。[20]

第三，民族主義之興起。提供近世政治從中世的分裂再度走向統一的基礎是民族，結成民族意識則需達成某種程度的文化階段。中國在中世以後，民族對立主要的舞台已不在長城內的中國本部，而是以長城爲界，形成長城以南漢人國家與長城北面蒙古地方遊牧民族間的對抗。唐代中期以後，圍繞在中國周邊的民族，藉著文化的發展而產生民族自覺。宋代以後，勢力強大的異族政權接連倔起，不僅使宋朝疲於應付，也迫使中國王朝傳統的世界觀發生變革。漢人於此時初次出現民族自覺，團結國人，對內支

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248；礪波 護、間野英二，〈宮崎市定〉，243-244，248；宮崎市定，〈桑原隲蔵博士について〉、〈独創的なシナ学者内藤湖南博士〉、〈『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巻 解説〉，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234-235、249、542。

19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149-156；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5 近世とは何か〉，《宮崎市定全集》，第1卷(東京：岩波書站，1992)，64-65。

20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170-174；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5 近世とは何か〉，59-60；宮崎市定，〈『アジア研究』第三 はじかき〉，503-504。

airiti

持國內的政治統一，對外產生強烈的攘夷思想。北宋亡後，南宋還能延續 150 餘年的國祚，入元後，甚至還有人憑宋室子孫以圖恢復，原因就在於此。不過，蒙元統治與清朝入主並不曾削弱蒙古人、滿人與漢人的民族主義，影響政治的統一。東洋近世的民族主義，由於地形的單一性，大家均強調絕對壓倒對方。但在擴張政治版圖的同時，統治者選擇容易進行的方式進行同化政策，結果反而讓進入中國內地的統治民族融入漢人的文化內，化一成一個文化上的民族主義。近世的中國沒有因爲民族主義發達而分裂成更小的民族國家，或許就是元朝或清朝的統治者採取緩和的民族主義，犧牲征服者的權利所致。[21]

第四，建立君主專制體制下，國家類型與官僚體制的運作圖像。宮崎市定的近世政治型態論述，主要在內藤湖南的理論架構上，進一步把專制政治的實踐刻畫出來。首先，在國家類型上，從唐末以來，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從與武力國家轉成「財政國家」。國家透過兩稅、商稅和鹽專賣事業等，充分掌握全國之內可用的利源，以之支援直屬皇帝控制的軍隊、官僚體系。因此，文官出身的財政官僚比武官更受重用，而升遷也受經濟、財政的處理實績左右。另外，官僚由皇帝直接掌握的科舉制度出身，與皇帝建立起絕對的上下關係。皇帝位居官僚體制之首，手握政務最終的裁決權，舉凡官員的人事調整、財政之盈虧，臣僚均需請皇帝裁可。又因唐末以來實施兵農分離制度，不只禁軍，連全國的戰鬥部隊都直屬天子。中央政府因此需要養活龐大的軍隊，官員則配合從地方上抽調更多的資源，故「財政國家」、官僚體制，加上兩者扶持起來的軍隊，更加強化君主專制政治，地方政務由此益行複雜，官僚的職務也更加專業化與職業化。因此，在專制政治之下，除了官僚群外，地方上又出現了一群專門處理政事的胥吏。[22]

一般在討論「中國近世」的時候，都把宮崎市定的論述當作內藤湖南的補充。透過上述四項特徵可以知道，宮崎市定所作的工作不只補充內藤湖

[21]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195-211；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5 近世とは何か〉，70-71；宮崎市定，《アジア史》，《宮崎市定全集》，第18巻(東京：岩波書店，1992)，192。

[22]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166-169、175-194；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5 近世とは何か〉，60-63。

airiti

南的論述。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補充之處之所以受到肯定，正充分證明他們兩人的不同之所在。若再從一種有別於內藤和宮崎市定的角度來看「中國近世」，又會得到什麼形象？郝若貝的論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郝若貝(1932-1996)於 1982 年，在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上發表了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一文。全文主要在回答：「1550 年以後的中國，爲何無法超越 750-1550 年之間，中國人不論在物質或政治、社會、藝術、科學、知識各方面，均取得輝煌的成就？」這個問題。[23]他認爲，這段期間，中國經歷了一段過程，而這個過程究竟是如何，得從系統性地分析幾個「農業區」在不同發展階段時，各自內部的發展動力，並仔細觀察在不同的時間點，這幾個主要區域在社會性質上彼此之間逐漸增加的影響力。於是，他把這個過程的時間訂在 750 年到 1550 年之間，利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3-2008)「核心—邊陲」的區域理論，從以下四方面來考察「中國」在這八百年間的變化，分別是：(一)各區域內部的發展；(二)區域之間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組織；(四)菁英分子社會與政治行爲之轉變。由他的推論，我們可以看到八百年間，「地方的中國」的變化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其一，移民、區域開發與人口數的成長，是推動中國歷史的基本動力。郝若貝將中國畫分成嶺南、東南地區、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西北地區、華北地區等七個區域，認爲在 750 年到 1550 年之間，由於大規模的疫病、晚唐的戰亂、1194 年的黃河改道、蒙古入侵、首都位置(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北京)、有效的交通運輸管道(大運河)和引進農耕新技術等因素，上述七大區域，在區域內，歷經邊陲、快速發展、系統性地衰退與恢復平衡四個階段，帶來區域開發、人口密度分布的消長、核心地區、市場網絡、經濟成長、中心城市、行政組織和社會階層的變化。區域內人口密度的增減也影響非農業與相關生產技術之繁榮與否。而在區域之間，南方四個區域的人口密度逐漸高於北方的西北和華北兩地區，使得長江中、下游和東南三區域的重要性益愈增加。從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

[23]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Dec., 1982): 366.

airiti

快速增加的人口填滿了這些稻米生產區。到十一世紀末，南方區域，不論在經濟或人口的優勢，都已取代北方區域。可以說，唐末到北宋時期的區域開發，爲中國的人口分布地圖帶來根本性的變化。[24]

其二，地方行政結構複雜化與中央權威之弱化。唐朝和宋初之時，地方行政最重要的徵稅、訟獄和治安工作，均屬「州」和「府」的職能。人口增加的結果，由州和府直接控制的日常行政工作越來越難以執行，故除了州、府下屬的「縣」數量增加之外，原來的三大職能也交由縣來執行。又，由於人口密集區擴大，縣的數量和工作重要性日增之故，幾個大區域內的協調性也比從前重要，故而統合諸州、縣，設置介於中央與基本地方行政單位之間的行政層級。北宋時代的各路監司、南宋時代的四大總領所、元代的行省即屬之，是爲溝通地方與中央的主要管道。同時，唐末以來，爲抽調地方資源而產生的「三司使」(鹽鐵司、度支司、戶部司)式的專業官僚，發展到元豐官制改革(1082)時戛然而止。接下來的 150 年間，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從跨區域的專業官僚手上轉入地域團體手中，他們專爲各區域內的利益著想，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出現高度地方主義的傾向。總之，在 750 年到 1550 年之間，地方行政架構呈現中央與地方直接的垂直連繫越來越弱的現象，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因人事問題而有高度地方化的傾向，兩者削弱了國家實現專制權力的可能性。[25]

其三，地方士紳成爲中國地方社會的主力階級。中國南北人口密度分布的變化與政府組織改造的結果，政治的領導階級內部也發生改變。宋初的 150 年間，主導朝廷決策和財政事務等高級職位的是建國菁英(founding elite)和半世襲狀態的職業菁英(professional elite)。後者經常主張他們源自唐朝以來的世家大族，講究郡望和家族性質相同的婚姻關係。這兩種菁英家族大多來自北方。但隨著南方的人口與經濟逐漸取得優勢，從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初之間，越來越多南方出身的官員進入朝廷的高級職位。郝若貝稱這群人爲地方士紳(local gentry)。宋朝以後的科舉制度，製造出一群和職

[24]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367-394; 425.

[25]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394-405; 425.

airiti

業菁英採取不同經營策略的地方士紳。他們採取策略婚姻，注意在地的經營，形成一批足以和職業菁英抗衡的政治團體。又十一世紀以來，朝廷激烈的黨爭，迫使職業菁英也不得不採用地方士紳的經營策略，保障家族的存續。故從十二世紀開始，地方士紳終於成爲政治上的主角。他們利用婚姻、控制進出科舉的管道以保障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獨占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資源。[26]

三、討論

經過文本的整理，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中國形象，一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呈現的中國歷史的「先進性」，一是郝若貝論旨所在的「停滯性」。他們共同有一個比較的對象，即「文藝復興」以後，在文明上不斷領先世界各地的歐洲。無論是因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對所處時代懷抱強烈的希望，拒斥黑暗的「中世」，賦予所處時代「近世」光明的意義，又或通過後來歷史家的研究，發現近世存在許多中世沒有的「領先」現象，如政治上走向中央集權國家，社會上是個人人身束縛的解放，經濟上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文化上是市民生活的合理主義文化興起，宗教上則是基督新教的展開等。將這樣的文明當作「進步」象徵的意識型態隨著歐洲人的擴張，於全世界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而成爲判斷非西歐文明之優劣的標準看法。有人稱此文化現象爲「資本主義」的世界觀，亦有人稱之爲「現代性」。[27]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和郝若貝論述中國在宋朝以後的發展，顯然也以「現代性」之具備與否當作標竿。但他們並非單純地比較中國和歐洲的近世現象。以上述的歐洲概念爲基礎，中國文明「固有的現代性」呈現在什麼地方，才是三人論文的重點。

---

[26]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405-425.

[27] 大島康正，《時代区分の成立根拠・実存倫理》(京都：株式会社燈影舎，2001)，第二章〈時代三分法の成立根拠〉，55-92；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Immanuel Wallerstein 著，郭慧英 譯，第二章〈西方、資本主義和現代世界體系〉，13-22。

airiti

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和郝若貝如何鋪陳中國文明「固有的先進性」？看看他們把中國文化置於什麼環境，從中理解中國的近世與歐洲不同之處何在，或許是一個好方法。

內藤湖南是在「東洋史」的環境中看中國近世的發展。內藤湖南的時代，「東洋史」在日本學界還是一個新潮的概念。簡而言之，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躍居近代國家之列。企圖擺脫中國之文化附傭與西方之邊緣地位的日本，開始重新思考日本與中國，以及日本與亞洲的關係。「東洋史」於焉誕生。這種新歷史的寫法，確立了日本作爲亞洲最進步的國家與歐洲並駕齊驅的地位，也確立日本有別於中國，而且在文化、思想和結構各方面，都遠比中國優越。[28]

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論述，無疑也受此風氣影響。不過，他更重視以中國文化爲中心的東洋文化的價值。他不否定歐洲物質文明的進步，卻對東洋文化的價值受到輕忽表現憂心。他曾表示，由於日本的文化皆從他國輸入，不如中國的文化是自發產生，歷史悠久、根底深厚。但是，文明的中心會移動。從古代到近世，東洋的文明中心雖然都在中國，當時東洋的文明中心卻已經在日本。日本應該用其融合了中國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創造出來的、屬於日本的新文化，扶持中國，使中國完成現代化。因此，內藤湖南特別主張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唐宋以降，中國文化帶有的「獨特」近世特性。[29]而且，筆者認爲，由於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局勢即使不穩定，但推翻君主專制體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工作，在內藤湖南眼中，正是中國文化進步的象徵。中國根植於自己土地創造出來的進步文明，與歐洲和日本的近世文化自然有差異，而日本想要重新回到亞洲，坐穩東洋文明重心的寶座，自然得面對、了解其曾經盡力模仿的中國文明的先進性不可。

---

[28]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2-15;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卜正民(Timothy Brook) 著，李榮泰 譯，第四章〈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書寫〉，164-166；江上波夫 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2-4；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175-176。

[29] 大谷敏夫，〈湖南の中国文化論と政治論〉，74-86；卜正民(Timothy Brook) 著，李榮泰 譯，第四章〈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書寫〉，168。

airiti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序言想要傳達的意含及其研究中國史「固有的現代性」的目的，在此無疑。

宮崎市定同樣把中國當作東洋史的主體，但論述的架構與對話的對象卻與內藤湖南大不相同。宮崎市定的論述架構，建立在「世界史」上。他主張，討論「世界史」不該應以歐洲爲中心，否則就會落入「落後的亞洲」、「發展停滯的亞洲」之窠臼中。研究亞洲史，抑或世界史，應以西亞爲中心。因爲西亞首先出現進步的文藝復興現象，之後，文化逐漸東移，刺激近世中國之產生。此後，進步的中國文化傳到歐洲，爲成歐洲文藝復興的養料。這些進步的文化，最終在日本開花結果。[30]所以，中國的近世文化，也是東洋的近世文化，不是東洋自身歷史過程的產物，而是和西亞互動的結果。

乍看之下，讀者會以爲，宮崎市定判定「近世」的標準，似乎全世界一體通用。事實上，他追求的歷史不允許如此。他認爲，世界史並非萬古不變之物，即使在同樣的理論基礎下，西亞的近世現象、中國的近世現象、歐洲的近世現象，都有不同之處。他對唯物史觀的批判，尤可見此。宮崎市定在就讀京都大學時，就曾修讀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唯物史觀課程。他覺得，用哲學來處理的歷史、歷史學是抽象的，不是真的歷史、歷史學。歷史學的問題應當在歷史學內部加以解決，而非假借哲學之手。史觀也是如此。史觀僅僅只是史觀，而非史實。與其把重點放在抽象的學說上，研究具體的歷史事實更加重要。持唯物史觀的中國史論述，只是強行把史實套在馬克思的時代區分論上而已。不顧史實與發展的差異，勉強運用歐洲的時代區分在其他的區域，無異於削足適履。就算是再傑出的史觀，也應該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修正。真要把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三階段運用於中國的話，漢代到唐代可以算是一個時代，宋代以後則是新時代。[31]因此，當我們看到宮崎市定論述中國近世時期的幾個特徵，舉凡資本主義、君主專

---

30 宮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第二 はしがき〉，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495。

31 宮崎市定，〈書評『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422-427；宮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第三 はしがき〉，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501-507；宮崎市定，〈『アジア史論考』〉，收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597-606。

airiti

制政治、民族主義等，無疑是受到西方歷史論述的影響，但在實際的內容上，中國的近世無疑是西亞與中國內部自發力量交融的結果。這點，並非唯物史觀可以解釋。

郝若貝爲文章設定的中心主旨以及採用的研究方法，極能代表美國學者的中國史研究法。早從中世紀末期，歐洲人就對中國充滿興趣。而自十八世紀末以降，歐洲人的中國印象，開始由正面轉向負面。也由於西力東漸之故，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歐洲的漢學研究達到高潮。來華的歐洲學者能夠接觸的史料和出土文物更多，研究中國得到的知識，也爲歐洲學術提供新的養分。到二十世紀初期，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刺激學術界重新思考現實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社會史思潮逐漸成爲顯學。當時的漢學家習於挪用歐洲史的問題來研究中國，並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理論。於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論和韋伯(Max Weber)對中國社會理解，便成爲研究中國爲何不能像歐洲那樣擁有「現代性」的重要指引。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漢學研究的重鎮由美國取代。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美國的中國史，尤其是明清史研究，出現許多突破性的作品。這時期，把社會學理論運用於中國史研究，而對美國漢學產生重大影響者，非施堅雅莫屬。此後，問題研究的重心，也就從統治者、上層人物，移轉到基層社會。[32]

從區域史來看中國史，難免使中國史陷入破碎化。不過，郝若貝在文章中關心的課題，不是單個區域內部，而是區域之間的興替，以及討論資本主義社會理論的中心課題，即「中等階級」在近世的出現與角色問題。就論文的主旨來說，1550 年後，中國陷入長期的停滯，以致無法產生西方那樣的產業革命，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與西歐的發展方向不同，是一大原因。因此，從區域發展史的角度出發，750-1550 年間發展出政治、經濟

[32]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Gregory Blue 著，宋家復 譯，第三章〈「中國」與近代西方社會思想〉，79-146；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李榮泰 譯，第四章〈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書寫〉，147-218；胡志宏，《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第一章〈西方漢學早期發展脈絡〉，1-59；第五章〈漢學領域的社會史研究(下)〉，242-244。

airiti

和社會結構，帶有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現代性」乃無庸置疑。而實際上，中國的「現代性」發展，隱含著關鍵性的缺陷，使之無法將 750-1550 年間取得的成就延續下去。

以上，我們看到兩種論述中國近世史發展的架構，一是內藤湖南與宮崎市定企圖讓中國史脫離西方的附庸，重建不同於歐洲、專屬於亞洲的「現代性」歷史論述。對他們而言，中國文化帶有的先進性不曾中斷，而是按照自己的步調在前進。一是郝若貝，分解中國、重視區域發展差異的中國歷史研究取徑。他肯定中國曾經存在自發的「現代性」發展，但是提問的方式仍舊是「西方式」的。基於不同的立論背景，三人論述的政治結構與社會結構也有不同的結論。

內藤湖南的觀念中，中國中世貴族政治勃興，可追溯到東漢以來，名族在政治領域與社會活動方面的重要性增加，以及官吏錄用之法對這些名族有利之上。在魏晉南北朝王朝更迭頻仍的時代，皇帝即使掌握政治權力，卻與重視門閥出身的名門之族無法平起平坐。他們沒有對皇帝盡忠的打算，在政治與社會上自成一股力量，阻礙國家的統一。貴族政治與唐朝一起結束，並非統治階級從內部自發、加以打擊的結果。唐中期以後，府兵制崩潰，藩鎮節度使與軍人職業化取而代之，造成朝廷無法控制地方的兵權與財政權。加上隨之而來的騷亂，連朝廷的中樞也受到波及。到了唐末，宦官、出身低賤的武人已足以左右皇帝的生殺大權，摧毀貴族政治最後的基石，即是明證。[33]五代的政局幾乎是在反覆演出唐末武人跋扈的狀況。宋代的政治架構可說是爲了解決貴族政治造成國家各階層無法團結的窘狀而生，這也是內藤湖南將宋代以降的中國區分爲「近世」的原因之一。

中國近世的政治特徵是君主專制政治。支持中世政治結構的貴族社會從唐朝中期以後逐漸瓦解，隨之改變皇帝的權力基礎和官僚組成方式。簡而言之，中世的政治權力是多元的存在，皇帝的權力與支持政權的貴族集團共享；近世的政治權力則是皇帝專屬，官僚組織只是皇帝底下的辦事機

[33] 內藤湖南，《支那中古の文化》，《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285-289、324-328；內藤湖南，《支那近世史》，360-368。關於內藤湖南中國中世貴族制的理論，請見福原啟郎，〈內藤湖南の中世貴族成立の論理——『支那中古の文化』の分析を通して〉，收入內藤湖南研究会 編著，《內藤湖南の世界》，277-304。

airiti

關，不能分享皇帝的權力。既然政治權力已爲皇帝一人掌握，而非與官僚共享，黨派的結成方式與黨爭的爭執重心，也就與中世的黨爭形式不同。這樣的政治結構，很容易造成「頭重腳輕」的弊病，影響全國政治實施的一致性，改變地方政治的進行方式。

內藤湖南區分中世與近世的概念，與西洋史的分法相似，但無論如何，政治結構的變化，都源自中國歷史發展本身。宮崎市定也很強調這一點。[34] 但他注意到內藤湖南不曾提到的現象，那就是強化近世君主獨裁政治的經濟因素。這可以分成兩點來說明。

第一是削弱中世貴族的自立力量。由於唐朝以強大的武力維持長期和平，中央集權的傾向漸漸出現，中央政府的組織變得龐大，包括國都在內的關中地區，因政治原因，帶來消費經濟無比繁榮。貴族官員在任職地點國都附近的方便地區尋求據點，以政治勢力取得碾磑等利權。在這種經濟背景下，他們逐漸擺脫豪族的性質，遠離對莊園的依賴，使得官僚貴族的性質變得濃厚。

第二是中央政府的利源擷取技術與財政支配加強。中世國家，因爲分割勢力強大，屬於武力國家的性質。當時中央政府可直接支配的地方，僅限於國都一帶，皇帝的權力無法貫徹到地方，而皇帝可直接掌握的兵力與財力也很少。地方政府相對中央政府來說，自立的傾向高。但隨著唐朝和平，帶來經濟情況之變化，消費經濟逐漸取代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又，面對安史之亂後的政局，唐朝進行政府組織、鹽專賣事業與稅法改革，用以支持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國家性質漸漸「財政國家」化。宋朝以後，城市商業更加發達，政府可抽取之稅利更大。如此，掌握利源的天子，加

[34] 宮崎市定指出，中國中世的貴族制，乃與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有關，與日本古代的貴族或西洋的近世貴族有極大的不同。日本或西洋的貴族，在那個時代，都有助成政治統一的作用。但是，中國的中世貴族，因其自主性極強，反而助長分裂的局勢。因此，將中國的中世比作西洋的「封建制」，概念將與史實不符。封建制是野蠻民族入侵文明地域，接受文明化之際，經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可能出現在古代，也可能出現在近代。而中世=封建制的歷史特色，也只符合歐洲的情況。結果，由於「封建制」不具時代特性，而且，任何時代都有貴族存在，因此，能判定中國中世政治結構特色的，只有貴族對王朝的向心力與離力心兩種而已。他特別以「貴族制」指稱中國中世的目的在此。見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4 中世とは何か〉，51-55。

airiti

上兵制之變革，全國的精銳部隊由皇帝一人控制，鞏固了獨裁君主的權力基礎。

官僚組織之變革也是支持中國近世君主獨裁政治相當重要的一點。內藤湖南提到，中世門下的封駁之權，在宋代以後日益衰退，宰相的地位不再是輔佐天子，反而變得像秘書官差不多。雖然宋代仍出權相，但他們的權力，依賴皇帝的支持。到了明代，宰相之職取消，由殿閣大學士取代之。官僚任用標準，也從門閥主義過渡到人格主義，到宋代以後，經王安石改革，變成了實用主義。[35]宮崎市定更進一步說，唐末以來，官制上直屬皇帝管轄之機關增加、政府與軍隊分離、文臣控制兵權以防武將專權，以及皇帝與進士之間建立私人關係，都有助於君主獨裁政治之穩定。尤其科舉官僚，他們負責帝國財政收支，正好呼應近世的經濟景氣與專制權力之連繫，可稱爲是實質上的「財政官僚」。[36]

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在君主專制政治現象的敘述上，大體上是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立論。從地方行政區畫的角度來看又是如何？內藤湖南也曾經考查中國地方政治組織從漢代以來的演變過程。簡而言之，即中央政府的特派官逐漸演變成純粹的地方官；原小範圍行政區畫上的監督領域逐漸演變成實質的地方行政單位。他引用顧炎武、黃宗羲的意見，認爲這種大區域的行政畫分，有維持朝廷穩固的功用。[37]由於直屬皇帝的特派監督官伴隨著行政區畫分擴大化，君主專制政治的制度設計也延伸到地方。中國近世地方行政單位的層級越來越多元的同時，也是君主專制政治最強化的時代——明朝和清朝。

郝若貝對內藤、宮崎的近世獨裁政治論，其實抱著不同的意見。他認爲，全中國由 306 個州、府組成的行政控制管道萎縮成 18 個行省，代表皇帝對於組成帝國各區域直接的控制權威減弱。元豐官制改革以來，中央行政組織重整、高官的位置由缺少行政經驗的內閣出身的人員來擔任而變得

---

35 內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の意義〉，351、354-355。

36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175-189；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5 近世とは何か〉，60-63。

37 內藤湖南，《支那論》，〈三 內治問題の一〉，352-355。

airiti

較不重要、皇帝和首都官員之間越來越大的社會距離，以及提供朝廷官僚的菁英家族團結性降低，只是使得皇帝的地位對於宰輔大臣而言相對提高，而非絕對提升。[38]皇帝確實能夠掌握的大權，在人口稠密區不斷擴大，行政結構不斷重組，社會階級結構調整的同時，也被弱化了。

政治結構論述的不同角度，也引導社會結構的論述走向不同的方向。內藤湖南認爲，中國到了近世以後，隨著貴族政治解體，君主專制政治建立，反映在社會結構上的是平民地位提升。人民地位的性質，與經濟結構有關。中世時期，人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受到國家與貴族支配，形成猶如奴隸的階級，沒有遷徙的自由，私有財產也不被承認。但因兩稅法實施之故，人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被解放出來，有了自由支配勞務的權力，蓄積私產也得到認可。人身自由之取得、貴族階級之消滅，人民成爲直接面對君主的階級。[39]

內藤湖南所謂的平民，顯然是廣義的「平民」。宮崎市定對「平民」的考慮則更深一層。他在《東洋的近世》裡提到，近世官僚選舉仰賴科舉機制，設計原意在使四民都能平等獲得任官的機會。不過，受到近世經濟制度與經濟環境改變之故，非居處經濟優勢的富農、富商，或具有家學傳統者，難以參加科舉。久而久之，這群在社會上新成形的社會階級穩定了下來，集文化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讀書人、官僚、地主或資本家三種身份於一身，成爲一種「新貴族階級」，也就是一般俗稱的「士大夫」。法律地位與士大夫平等的佃戶，由於處於經濟弱勢的窘境，實際的社會地位低下。[40]這種以士大夫——平民爲主的社會結構，在宋代以後的社會一直存在；平民，尤其是農民，他們的聲音小，力量輕微，無法形成有力的組織，士大夫階級爲成主導政治與社會走向的主角。

郝若貝從區域發展的分析中發現地方有力家族發展的歷史軌跡，以及他們的家族發展策略與扮演角色的變化。前面提過，西方學者不論是在研究歐洲或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時，不免與資本主義牽扯上關係。資本主

[38]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404-405.

[39] 內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の意義〉，352-353。

[40]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187-188。

airiti

義的歷史論述中，不管在政治上，或者社會、經濟問題上，「中等階級」有否存在，作用如何，一直是重要的探討對象。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西方研究明清史的西方學者的作用集中在討論中華帝國晚期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41]郝若貝把地方菁英家族發展策略與角色改變發生的時間點定在南宋，很明顯是要告訴我們，明清社會菁英的形成，始於兩宋之際。南宋的社會菁英有感於朝廷的政治鬥爭激烈，在朝爲官前途不明，又行政權威從中央向地方傾斜、解試採取名額配置，於是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地方事務，減少送進官場當官的子孫人數。[42]延續郝若貝觀點的韓明士(Robert Hymes)觀察江西撫州的例子，也指出，所謂「地方士紳」(local gentry)，在家族的經營策略上，傾向以自家所在的地域爲主，任官不求朝廷高位，家族子弟的職業選擇也以分散風險爲導向。他們善於主持地方事務，辦理造橋鋪路、教育、慈善救濟等工作，並於遭遇盜賊或兵燹之際則組織武力，保衛鄉里。[43]這種在南宋出現的新社會菁英，一方面包括宮崎市定所說的「士大夫」，一方面也包括這些士大夫那些不當官的家族成員。他們適時地填補了南宋朝廷窮於應付北方的金朝而在地方上留下的權力空間。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某種對抗朝廷干涉的地方主義的興起，感受到地方的獨立性格。換言之，南宋的地方菁英及其在地方上的活動，是君主專制權威萎縮的象徵之一。因爲這種社會型態在南宋以後的中國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因此，把南宋以後的中國畫分成另一個時代也不爲過。

然而，以上，內藤．宮崎對於政治結構的討論，或是郝若貝從地方行政層級演變而對內藤湖南論點的駁斥，都可以看到「制度設計」是共同的討論焦點。制度設計與實際執行的結果可能未必相稱。從內藤湖南的觀點來看，中國近世君主專制政治的制度設計本身，適足以阻礙專制政治的成效。他指出，自從隋文帝開始實施本籍回避制度以來，擔任地方官的官員

---

41 胡志宏，《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第五章〈漢學領域的社會史研究(下)〉，262-282。

42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424.

43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iriti

全是外來者。加上進入宋代以後，皇帝掌握了政務最終的決定權，對地方官無法完全授權，於是，擔任地方父母官者只求賦稅能夠按時繳納、地方不出盜賊輒止。三年期間，營私舞弊，放任胥吏張牙舞爪，與人民休戚相關的事務全不考慮，人民自然也不奢望官方提供保護。結果，上自縣級，下至村落，舉凡救濟、育嬰、教育、義莊義田、地方的治安工作等屬於地方官的治民要務，多由地方上的「自治團體」自爲之，不假官方之力。到清朝末年，甚至如白蓮教的叛亂活動，也依賴地方招募的義勇兵敉平，官軍全然無效。[44]這種源於對政府的不信任而產生的自治團體，指的是宗族組織、同業組合、農村的保甲制度。這種屬於社會所有階層共有的「自治團體」，在內藤湖南看來是「進步的」象徵：訴求守護當地社會，對抗專治政治之爪牙(地方官、胥吏)的自治團體，是中國史上自近世以來逐漸孕育出來的共和政治的種子。[45]可是，對君主專制政治而言，矛盾的官僚任免、授權制度與發達的自治團體，無形中成爲一種阻礙。談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專制君主論時，應該要注意他所謂的「弊害」，而這弊害恰好是中國近世君主專制政治內在的矛盾所造成。

郝若貝從地方行政組織沿革中引申出來的中國近世非君主專制論述又是如何？

郝若貝在文章中告訴我們，人口、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轉變，是永恆的。在一篇討論北宋煤鐵工業革命的文章中，他把北宋時期的煤鐵業和1540-1640 這一百年間的英國早期煤鐵業發展相比，認爲北宋時已有同等的規模。中國早熟的煤鐵工業不能產生像歐洲那樣的工業革命的原因在於女真和蒙古的入侵與占領中斷了發展，而且，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也不利工業革命發生。[46]他給予宋代，尤其是南宋，一個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地位；在南宋之前，中國的經濟、人口都有長足地發展，並致使社會

---

44 內藤湖南，《支那論》，〈三 內治問題の一〉，368-369。

45 フォーゲル 著，井上裕正 訳，《內藤湖南》，194-198；吉尾 寛，〈內藤湖南の中国共和制論——『支那論』から『新支那論』への道すじを考えつつ〉，收入內藤湖南研究会 編著，《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內藤湖南研究会，2001)，196-201。

46 Robert Hartwell,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 A.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2(1962.02): 162.

airiti

結構產生變化，南宋之後的中國，開始走向停滯。如果，他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爲什麼 1550 年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沒能比得上，甚至超越之前的幾個世紀的話，那麼他的解答應該就藏在兩宋之際發生經營策略改變的社會菁英身上。

郝若貝的觀點對於闡述明清時代菁英本質的學者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和韓明士在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一書的〈導論〉中則提出，明清社會菁英的想法與作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南宋。因此，在郝若貝的基礎上，他們可以讓兩宋社會變遷的圖像變得更清楚。長期以來，我們都知道兩宋之際的士人發生「轉向內在」的傾向；南宋的士人從投入政治或制度改革的積極作爲退出，將自我修養當作唯一的關心事項，或是對社會義務與活動添加新的哲學和道德深度。但是，謝康倫等人指出，不再將注意力投注在中央，指的是關心新的、不同種類和層面的政治或社會行動，又或是仍將注意力放在政府的制度和行動上，但是採取與北宋時的樂觀中央集權主義不同的方法。他們認爲，南宋政府無法從有效控制的領土上徵收到足夠的稅收，加上邊境的壓力和戍邊將士的餉錢，朝廷只好將抽稅的觸腳和範圍延伸到任何可及之處。南宋的輿論認爲這種擴張是一種弱化的表現，但是，士大夫對於這種手段應該延續多久，又中央政府在正面的方法上應該做多少的看法都有改變。北宋時代，司馬光和王安石對朝廷制度該如何制度與實行的理想，在南宋依然有他們的傳人，不過，真正實行時該要如何設計，已經大異其趣。在謝康倫等人看來，「轉向內在」正是矯正北宋樂觀中央集權主義的基本方法。他們引用 Michael Freeman 的研究，指出《大學》是「轉向內在」的根源，是連結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結點，格物、正身和平天下是一個過程中的片斷。這表示，改造世界由自身開始，也表示自我的修養不是思考方式改變本身的目的。在很多方面，兩宋思想的變化，仍未排除對制度的興趣。儘管南宋的士人對於該怎麼做仍然有很多意見，他們對於國家與社會之關係的看法，結合了王安石大政府中心的改革理念和朱熹及其追隨者以地方建設爲中心的地方主義。[47]

[47] Conrad Schirokauer and Robert P. Hymes,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iriti

謝康倫和韓明士的推論暗示我們，儘管地方行政制度設計的結果，顯示南宋已經不再能維持像北宋那樣的中央集權制度，南宋士人討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該如何時，仍舊認爲國家的權力太大。地方社會菁英家族的出現，或許就是反映國家權力過大而興起的一股力量。只是，宋人所謂的中央集權並非內藤湖南所謂的「君主專制」。在宋人的討論中，皇帝應受敬重，而皇帝的權威仍應受到限制；決定政策方面的權威是在官僚身上，而非皇帝。黨爭在國家權威的分配上有重要的意義，因爲黨是推進限制皇帝權威的動力。這點對那些希望改造社會的道德主義者而言，甚爲可用，因爲他們不認爲皇帝是所有價值的根源。對那些希望限制國家干涉與容許私人決定之執行的人來說，也極爲有用。他們正希望國家在有限的程度上，支持地方社會事務。專制政治對兩方面的人而言，都不是理想的政治選擇。[48]

郝若貝的答案，到此或許已經昭然若揭。中國的歷史發展到宋代的時候，已經具備若干「現代性」。經濟開發的繁榮程度、一股反對國家過度干涉社會活動的中等階級力量之形成，正是這種現代性的表徵。但這股現代性的力量在南宋以後無法繼續延續下去。究其緣故，南宋朝廷面對的政治環境與北方的民族威脅，與北宋的情形大不相同。失去中央集權主義者支持的南宋朝廷，即使仍被認爲權力過大，干涉了地方社會的運作，但朝廷和社會菁英關注的國事，顯然大相徑庭。社會菁英要求國家不要干涉過多社會事務的同時，國家事實上也已經無法兼固社會事務的各個層面，因此讓社會菁英有自己組織地方事業的空間。由於國家已經無法與社會進步的各個面向齊頭並進，國家和社會之間無法結合成一個有機體，國家組織與社會結構便越行越遠。阻礙北宋煤鐵工業進展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有各式樣的組成分子，其中的社會菁英當然可以促成社會進步的因素。但當國家組織與社會進步的成就無法結合時，中國近世的發展狀況便陷入停滯。

---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ntroduction," 1-58.

48 Conrad Schirokauer and Robert P. Hymes, eds. *Ordering the World*, "Introduction," 36-46.

airiti

四、結語

前面的內容裡，筆者不厭其煩地摘要出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和郝若貝所寫文章的內容，並從他們立論的架構探究中國近世的政治架構與社會架構差別何在。現在再問，他們以爲的中國的近世，到底如何？

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觀中，存在一股「自發的」進步力量。這股進步的力量，不只帶動中國的歷史，更帶動日本的歷史，因爲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緊密連繫，強調以中國文化爲主體的東洋歷史的進步性，可以把日本重新帶回亞洲。若從西洋史判斷近世的根據來看東洋史，中國近世的君主專制政治的確符合近世的條件。然而，內藤湖南卻認爲，中國近世最大的成就，最足以稱之有近世水準之一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中國近世的文化現象，是中國的文化極爲成熟之後才能產生，歷史、經驗淺短的國民難以展現。這樣進步的社會，輕視政治的意義。士人希望在死後留下令人驚豔的文集，而非作爲政治家的本領。世人也把政治當作一種雜耍，精彩的表演拍手呼好，自己卻不原捲入其中。宋以後，持續到清代的近世文化，發展程度之高，進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王公，其文化生活與同時代的中國士大夫生活相比，還落後一大截。[49]

除了文化之外，中國近世君主專制政治的弊害帶來的副產品，亦即「自治團體」蓬勃發展及地域社會逐漸與中央政府隔絕開來這一點，也是近世中國進步的象徵。這點，前文已經說明，不再贅述。

在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裡，上古、中世的中國，與周邊民族都有頻繁的互動，似乎中國的歷史是在內部與外部的交流中，受到刺激才發展起來。近世的中國缺少外部的刺激，故而讓人有歷史停滯之感。內藤湖南的真意並非如此。中國進入近世以後，並非陷入停滯，反而是早熟的文化與相對獨立的地方社會，成爲中國歷史往「現代」邁進的基石。在他那個時代，中國還處於近世走向現代的混亂期。但他深深覺得，中國歷史這股往前邁

[49] 宮崎市定，〈独創的なシナ学者内藤湖南博士〉，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259-261；內藤湖南，〈近代支那の文化生活〉，《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20-139；フォーゲル 著，井上裕正 訳，《內藤湖南》，219-220。

airiti

進的「潛勢」必定引領中國完成共和政治體制之建立，從近世走向現代。

宮崎市定肯定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具有西洋近世的形式，但在內在方面，其實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的近世，地主與佃農之間階級的緊張關係，常常引不起重要的社會意義。農民的叛亂沒有組織力，容易被政府鎮壓下來。知識分子中的野心家或秘密結社若與這種階級鬥爭結合在一起，才有引發大規模叛亂的可能。但中國近世的叛亂，得利者往往不是被剝削的農民，而是秘密社會與異民族。宋元明清諸王朝的易姓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證。這種革命只能稱作政權爭奪的王朝革命，而非社會革命。宋代以後，在社會上地位穩定的士大夫階級並沒有因爲王朝易姓交替而遭到破壞，原因即在於此。[50]

缺代內部推動力的中國近世，往往會讓人聯想到「停滯論」。這並非宮崎市定的結論。宮崎市定架構的中國近世史，作爲世界史的一環，與西亞、歐洲的歷史有連帶關係。他說：「從世界史的立場來看，則東亞、西亞、歐洲各地區皆保存了傳統的特殊文化，而且在前後時代達到近世階段。然而，即使是相同的近世文化，每個文化之間也都發揮出各自的獨特性。如此一來，彼此之間產生了一種水平化的運動，後此相互影響。」[51]在他看來，中國的歷史，因爲持續與世界其他地區互相影響，故而沒有停滯的問題。當中國的先進近世文化影響到歐洲，推動歐洲的文化發展到更加先進時，反而會回饋中國，激起傳統社會結構之解體，消解國內的停滯因素。這大概是他能夠同意鴉片戰爭作爲中國之近世與最近世之分水嶺的原因。[52]

那麼，郝若貝的中國近世，又是如何？我們從他的文章裡看不出來中國近世的界限何在，但接受宋代以後是中國近世的論點，是沒有疑問的。根據他文章的時代斷限，唐後期到明中葉，應該算是近世的前期，而之後是近世後期。宋代處於近世前期歷史發展極爲勃發的時段，經濟、人口、社會變動，都有劃時代的進展。許多近世後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基礎，

---

[50]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173-174；193-194。

[51] 轉引自李濟滄，〈宮崎市定の時代区分論について——特に「宋以降近世論」と関連付けて——〉，《東洋史苑》78(2012.03): 20。

[52] 宮崎市定，《中国史》，〈総論 6 最近世とは何か〉，72-75。

airiti

都奠基於這段時間，尤其是南宋以後，政治結構與社會結構一反北宋時代的情況，對於明、清時代的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南宋處於整個近世期的中間，文化發展尚未定型，一切都還在變化中，但也奠下近世後期發展停滯的因子。應用施堅雅理論的這篇文章，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失去了華北領土的南宋，在區域開發不斷循環的過程中，發展逐漸飽和平衡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地方菁英建立起來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明確界限，都使得近世後期的中國，在政權長期的穩定和平下，呈現一種「停滯」的狀態。一個由「中等階級」支持的社會，在歐洲的歷史裡扮演著推動國家進步的角色，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地方社會、人口組成等因素下，反而成爲沉滯的磐石，阻礙了社會流動的可能。

清末以來，每當中國的歷史處在重大變動的時候，總有有識之之士在思考變動背後的原因時，爬梳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民國之際的內藤湖南、戰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聲勢高漲之下的宮崎市定，都是代表。郝若貝提出這篇論文，即使與美國研究中國的方法轉向有關，大概也不乏他對當代中國的關心。將他們的論述化約成是在歐洲資本主義進步歷史觀的籠罩下敘述中國近世發展的架構，應該不爲過。但在同樣的立足點上，因爲觀察的角度與對話對象的差異，導致不同的結論產生。如果對社會的滲透力強、官僚化、均質化的國家是「現代性」的表徵，而這樣的國家正好可以引領資本主義歷史的進程，那麼，我們看到三者描述的中國國家從宋代以後，就走向相反的方向；內藤湖南所論之君主專制政治的弊害、宮崎市定所謂之社會革命不曾發生，以及郝若貝所說之行政制度設計上的地方分權和社會菁英的發展走向，都證明了這一點。

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和郝若貝三人，一致承認宋代是中國史上一個重要、進步的時代，是近世中國的開端。但他們論述的時代特徵、歸納的結果那麼不同，足見討論中國歷史的複雜性。事實上，除了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唐宋變革論」，以及郝若貝的「兩宋變革論」外，研究中國史者，還有「明清交替論」。總總論述，五花八門，但都忽略了元朝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如何彌補宋代和明中後期之間的斷層問題，是近來研究中國近世史學者努力的目標。2003 年，由美國學者史樂民(Paul J. Smith)和萬志英(Richard

airiti

von Glahn)編輯出版的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可視爲具代表性的著作。該書的作者從農業、印刷業、醫學、士人活動等方面得到的基本論調是：在長期的過程中，南宋以來中國的發展，以江南爲中心來看，並沒有停滯的現象。在這個已經成爲中國核心區的地方，不論是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或文化方面，南宋、元以來的成就，更是奠定中華帝國晚期，各種現象發展的基礎。[53]這樣的論調，可說是奠立在郝若貝的基調上。蕭啓慶也主張金、元征服中國雖然帶來南、北失衡、中古和近世質素並陳的現象，但元朝統一中國後，南北文化統合所帶來的道學、通俗文化、藝術上的輝煌成就卻不容置疑，確立起中華帝國晚期文化發展的主軸。[54]1980年代以來，日本宋史學界的研究取向也脫離過去以宋史爲中心，討論唐宋或宋元、明、清等的比較性問題，而轉向以更長的時間軸與更大的空間概念，搭配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不只考慮單一課題，而是思考每一個中心課題與其他課題，例如財政與經濟、法制與地域社會之間的關係，從事中國近世史的研究。[55]

我們可以看到，近來的論述方式，越來越有「中國史自有其發展之內在動力」的傾向，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特性，而非單一的比較性思考，不論是朝代之間的比較，又或中國與歐洲的比較。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說：「我們只有通過現在的眼睛才能觀察過去，了解過去。」「(歷史學家)既是他所屬之社會的產物，也是該社會自覺或不自覺的代言人。」[56]筆者不厭其煩地舉出內藤湖南等三人對於近世中國的描述，一方面可以讓讀者了解學者所處時代和學風如何影響學者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一方面也讓我們思考研究歷史與自身所處環境的關係。歷史存在著許多的可能性，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去看，

---

53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4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第一章 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1-22；〈第二章 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23-54。

55 遠藤隆俊、平田茂樹、浅見洋二 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1980年代以降を中心に——》(東京：汲古書院，2010)。

56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著，江政寬 譯，《何謂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120、132。

airiti

就能看到不同的圖象。「現代性」作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以降討論中國史的核心目標時，或許正適合其時學者的需要。但當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面對世界性的經濟恐慌、環境浩劫時，追求「現代性」可能已經不是唯一的研究歷史之道。我們或許也該撇開「現代性」，重新看待屬於自己的中國史課題。

airiti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1. J. A. フォーゲル 著，井上裕正 訳，《內藤湖南：ポリディックスとシノロジー》，東京：平凡社，1989。

   Fōgeru, J. A., cho, Inoue Hiromasa, yaku. *Naitō Konan: poritikkusu to shinorojī*. Tōkyō: Heibonsha, 1989.
2. 大谷敏夫，〈湖南の中国文化論と政治論〉，收入內藤湖南研究会 編著，《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內藤湖南研究会，2001。

   Otani, Toshio. "Konan no Chūgoku bunka ron to seiji ron," in Naitō Konan Kenkyūkai, hencho. *Naitō Konan no sekai: Ajia saisei no shisō*. Nagoya: Kawai Bunka Kyōiku Kenkyūjo, 2001.
3. 大島康正，《時代区分の成立根拠・実存倫理》，京都：株式会社燈影舎，2001。

   Ōshima, Yasumasa. *Jidai kubun no seiritsu konkyo, Jitsuzon rinri*. Kyōto: Tōeisha, 2001.
4.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內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

   Naito, Konan. "Gaikatsu teki Tō Sō jidai kan," in Naito Konan, *Tōyō bunkashi kenkyū*, *Naitō Konan zenshū*. dai 8 kan. Tōkyō: Chikuma Shobō, 1969.
5. 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

   Naito, Konan. Shina jōkoshi, in *Naitō Konan zenshū*. dai 10 kan. Tōkyō: Chikuma Shobō, 1969.
6. 內藤湖南，《支那中古の文化》，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

   Naito, Konan. *Shina chūko no bunka*, in *Naitō Konan zenshū*. dai 10 kan. Tōkyō: Chikuma Shobō, 1969.
7. 內藤湖南，《支那論》，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東京：筑摩書房，1972。

   Naito, Konan. *Shina ron*, in *Naitō Konan zenshū*. dai 5 kan. Tōkyō: Chikuma Shobō, 1972.
8. 孔恩(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傅大爲、王道還、錢永祥 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Kong en (Thomas S. Kuhn), zhu, Cheng Shude, Fu Dawei, Wang Daohai, Qian

airiti

Yongxiang, yi. *Ke xue ge ming de jie gou*. Taipei: Yuan liu chu ban shi ye gu fen you xian gong si, 1994.

9. 吉尾 寛，〈内藤湖南の中国共和制論——『支那論』から『新支那論』への道すじを考えつつ〉，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 編著，《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内藤湖南研究会，2001。

   Yoshio, Hiroshi. " Naito Konan no Chūgoku kyōwasei ron: Shinar on kara *Shin Shina ron* he no michi suji wo kangae tsutsu," in Naitō Konan Kenkyūkai, hencho. *Naitō Konan no sekai: Ajia saisei no shisō*. Nagoya: Kawai Bunka Kyōiku Kenkyūjo, 2001.

10. 李濟滄，〈宮崎市定の時代区分論について——特に「宋以降近世論」と関連付けて——〉，《東洋史苑》78(2012.03): 1-22。

    Li, Jicang. "Miyazaki Ichisade no jidai kubun ron nitsuite: tokuni 'Sō ikō kinsei ron' to kanren duke te," *Tōyōshien* 78 (2012.03): 1-22.

11. 谷川道雄 編，《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

    Tanigawa, Michio, hen.*Sengo Nihon no Chūgoku shi ronsō*. Nagoya: Kawai Bunka Kyōiku Kenkyūjo, 1993.

12.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の思想次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3号(2008): 45-53。

    Tanigawa, Michio. "Naito Konan no shisō jigen," *Higashi Ajia bunka kōshō kenkyū* bessatsu dai 3 gō (2008): 45-53.

13. 妹尾達彦，〈世界史の時期区分と唐宋変革論〉，《紀要・史学》52(2007.03): 19-68.

    Seo, Tatsuhiko. "Sekaishi no jiki kubun to Tō Sō henkaku ron," *Kiyō, Shigaku* 52 (2007.03): 19-68.

14. 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收入劉俊文 主編，黃約瑟 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

    Qian Tian, Zhidian. "Gu dai dong ya de zhong jie," shou ru Liu Junwen, zhu bian, Huang Yuese, yi, *Ri ben xue zhe yan jiu Zhong guo shi lun zhu xuan y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2.

15. 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古代の終末〉，收入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

    Maeda, Naonori. "Higashi Ajia niokeru kodai no shūmatsu," in Maeda Naonori, *Genchō shi no kenkyū*. Tōkyō: Tō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3.

16. 柯睿格 著，陶晉生 譯，〈宋代社會：在傳統之內的變遷〉，收入陶晉生 等

airiti

譯，《宋史論文選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Ke, Ruige, zhu, Tao Jinsheng, yi. "Song dai she hui: zai chuan tong zhi nei de bian qian," shou ru Tao Jinsheng, deng yi, *Song shi lun wen xuan ji*, Taipei: Guo li bian yi guan, 1995.

17. 胡志宏，《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Hu, Zhihong. *Xi fang zhong guo gu dai shi yan jiu dao lun*. Zhengzhou: Da xiang chu ban she, 2004.

18. 宮崎市定，《アジア史》，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18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

Miyazaki, Ichisada. *Ajia shi*, in *Miyazaki Ichisada zenshū*. dai 18 kan.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92.

19. 宮崎市定，《アジア研究》，第1，京都：同朋舍，1957。

Miyazaki, Ichisada. *Ajia shi kenkyū*. Dai 1. Kyōto: Dōhō sha, 1957.

20. 宮崎市定，《中国史》，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1卷・中国史，東京：岩波書站，1992。

Miyazaki, Ichisada. *Chūgoku shi*, in *Miyazaki Ichisada zenshū*. dai 1 kan, Chūgoku sh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92.

21.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東洋史，東京：岩波書店，1992。

Miyazaki, Ichisada. *Tōyō teki kinsei*, in *Miyazaki Ichisada zenshū*. dai 2 kan, Tōyō sh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92.

22.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隨筆下，東京：岩波書店，1994。

Miyazaki, Ichisada. *Miyazaki Ichisada zenshū*. dai 24 kan, zuihitsu ka. Tōkyō: Iwanami Shoten, 1994.

23. 張邦煒，〈"唐宋變革"論與宋代社會史研究〉，收入李華瑞 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Zhang, Bangwei. " 'Tang Song bian ge' lun yu Song dai she hui shi yan jiu," shou ru Li Huarui, zhu bian, *"Tang Song bian ge" lun de you lai yu fa zhan*. Tianjin: Tianjin gu ji chu ban she, 2010.

24.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收入張廣達，《史學 史家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Zhang, Guangda. "Nei teng hu nan de Tang Song bian ge shuo ji qi ying xiang," shou ru Zhang Guangda, *Shi xue shi jia yu xian dai xue shu*. Guilin: Guang xi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8.

25. 愛德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著，江政寬 譯，《何謂歷史》，臺北：博雅

airiti

書屋，2009。

Ai de hua ·Ka er (Edward Hallett Carr), zhu, Jiang Zhengkuan, yi. *He wei li shi*. Taipei: Bo ya shu wu, 2009.

26. 福原啓郎，〈内藤湖南の中世貴族成立の論理——『支那中古の文化』の分析を通して〉，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 編著，《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内藤湖南研究会，2001。

Fukuhara, Akirō. "Naito Konan no Chūsei kizoku seiritsu no ronri: *Shina chūko no bunka* no bunseki wo tōshi te," in Naitō Konan Kenkyūkai, hencho. *Naitō Konan no sekai: Ajia saisei no shisō*. Nagoya: Kawai Bunka Kyōiku Kenkyūjo, 2001.

27. 遠藤隆俊、平田茂樹、浅見洋二 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1980年代以降を中心に——》，東京：汲古書院，2010。

Endō, Takatoshi, Hirata Shigeki, Asami Yōji, hen.*Nihon Sō shi kenkyū no genjō to kadai: 1980-nendai ikō o chūshin ni*. Tōkyō: Kyūko Shoin, 2010.

28. 蕭啓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Xiao, Qiqing.*Yuan dai de zu qun wen hua yu ke ju*.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2008.

29. 礪波 護、間野英二，〈宮崎市定〉，收入礪波 護、藤井譲治 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Tonami, Mamoru, Mano Eiji, "Miyazaki Ichisade," in Tonami Mamoru, Fujii Jōji, hen. *Kyōdai Tōyōgaku no hyakunen*. Kyōto: Kyō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 2002.

30.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

Brook, Timothy, Gregory Blue, bian. *Zhong guo yu li shi zi ben zhu yi: han xue zhi shi de xi pu xue*. Taipei: Ju liu tu shu gong si, 2004.

31. Elvin, Mark.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2.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Dec., 1982): 365-442.

33. Hartwell, Robert.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 A.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2(1962.02): 153-162.

34. Hymes, Robert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 Kracke, Jr. E. A.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Far Eastern*

airiti

Quarterly 14.4 (Aug., 1955): 479-488.

36. Liu, James T. C. and Peter J. 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 ?*. Lexington: D.C. Heath & Co, 1969.
37. 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 (Aug., 1955): 533-552.
38. Schirokauer, Conrad and Robert P. Hymes,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9. Smith, Paul J.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iriti

Comparison of Naito Konan, Miyazaki Ichisade and Robert M. Hartwell's Views of the T'ang and Sung periods

Yao, Cheng-Chih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hen we talk about who leaded the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to the new direction, it should be Naito Konan. He was appointed as professor of oriental history and began to lecture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at Kyoto University in 1909. The embryo of "Naito Hypothesis" was brought up at the same time. In 1914, as the book, Shina ron (Essays on China) which he talked about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published, the more complete "Naito Hypothesis" was born. After World War II, the history circles in Japan started to review the history theory of Imperial Japan, and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Naito Hypothes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which Naito Konan put forth came with the tide of fashion. Miyazaki Ichisade is the man who struggled to maintain Naito Hypothesis best also came from Kyoto University. Though Miyazaki agree with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which was put forth by Naito, he applied Kuwabara Jisysuzō's idea whic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y of West Asia. He thought that the process of history of West Asia, China and Europe developed one by one and influenced one another, the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s of modern China. He enhanced the social aspect and economic aspect which was rare addressed by Naito Konan as well and revised the issue that meant the position of common people was promoted. Naito Hypothesis was also popular in the Sinological circles of USA. Robert M. Hartwell debated th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iriti

population density could change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s. He challenged the "theory of despotism in modern China" of Naito Konan from the local history concepts.

However, the articles which try to address the "modernity" of modern China had different conclusions under various times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I think that I can generalize two typ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hile compare the point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s which issued in the articles, that one is Naito and Miyazaki's "inherent advanced" and one is Hartwell's "stagnation after development". No matter what type, the history after Song dynas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Europe.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hypothese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rticles which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 to discuss the "modernity" of China issued. Recently, "Song- Yuan-Mi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which makes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y as one period attracts lots of consideration as well. We can discover that the way of discusses more and more incline to idea that "there are inherent advanced dynamics in the history China". They think deeply the continuity in the processes of history and not simply to compare between dynasties or China with Eurpoe.

Keywords: Naito Konan, Miyazaki Ichisade, Robert M. Hartwell, views of the T'ang and Sung periods, modern, modernity